

碑帖鉴定浅说

马子云

紫禁城出版社

马子云著

碑帖
鑒定
淺說

紫禁城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碑帖鉴定浅说

马子云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3.75 字数：60千字 图版：18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314·036 定价：1.00元

目 录

序.....	(1)
一、碑之起源与发展	
碑之起始与发展.....	(3)
碑碣之分.....	(6)
碑额与穿孔.....	(7)
碑与碑趺.....	(10)
碑额标题之书体.....	(13)
碑额标题位置与字数.....	(16)
建碑举例.....	(17)
碑文之概况.....	(20)
君讳与谥曰.....	(23)
碑文之撰与书.....	(24)
镌刻与摹勒.....	(27)
僧吏之镌刻.....	(29)
石师石匠之镌刻.....	(31)
选石.....	(32)
书体演变之概况.....	(33)
古碑一刻再刻.....	(43)
所谓“升碑”.....	(48)

碑之“立与刻”	(49)
二、碑贴之分	
碑之装裱	(51)
帖之产生与其形式	(52)
名帖简述	(53)
勾勒上石、刻字与传拓	(58)
帖之装裱	(60)
三、墓志之由来与演变	
墓志之产生与碑禁	(62)
邙山出土晋志与小碑	(63)
墓志初期之形式	(64)
墓志演变与特殊形式	(65)
墓志记事之始	(68)
墓志之书法演变	(70)
墓志志盖	(73)
墓志之撰与书	(75)
四、如何鉴定碑帖	
鉴定碑帖人皆可学	(78)
开始如何学习	(79)
碑帖用纸概况	(82)
碑帖传拓与墨色	(84)
鉴定之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	(86)
翻刻与伪造	(90)
新旧伪造各代石刻	(93)
新旧翻刻碑志	(99)
真本涂字与全面涂墨	(105)

序

余自青年始便与金石结缘，初则传拓，渐至鉴别研究，倏然竟至耄耋之年。平素将所见所闻，认识心得零星记下，近年来在同志们建议和鼓励下，整理成《碑帖鉴定浅说》一书。

此书所谈，涉及碑志之种类、形式、书法及其古今演变情况，拓本时代之鉴定等内容。以往谈碑帖考据之书，只有文字而无图片，不易明瞭，今附图于后，以便掌握。书中照片分两类：一为插图，随文附入，以（图××）表示；一为说明碑刻拓本考据图版，集中于书后，按刻碑年代顺序排列，在文中以（见图版××）表示。

另有一部稿子写在此书之前，名为《石刻见闻录》（尚未出版），记载各代刻石、碑志之存与佚、真与伪以及拓本之考据情况，皆以实际校对记录为依据，参考前人论述，纠谬补缺，按石刻之年代顺序为编。

此二书谨为金石、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些参考。余学识浅薄，囿于见闻，误舛难免，甚希指正。

郅阳马子云

1978年始，1979年10月完稿

一、碑之起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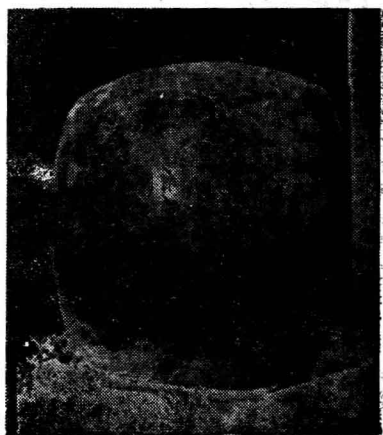
碑之起始与发展

我国古代铭刻现在所见最早之实物，为甲骨与商周之金文。石刻之最早者，为石鼓文。因其体圆而上平，故称之为石鼓。因其侧刻诗内容多为田猎事，故又有人称之为“猎碣”（图一）。

秦始皇廿六年兼并天下，至廿八年东巡邹峄山，继巡泰山（见图版二）琅琊台（见图版三）等处，均刻石颂德。石为长方形，似后来之无额碑，然不称碑而称“刻石”。

至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7年）《庶孝禹碑》（图二），已具备碑之体形，此乃碑之滥觞，到东汉始为最盛时期。

实际上，碑在秦以前就有，惟其用途与后来墓碑不



图一 石鼓



图二 《惠孝禹碑》

同，后人往往不大了解。据史书记载，两千年前已有碑。据

《礼记》，碑制有二：一为宫庙庠序中庭之碑，以石为之；一为下棺者之碑，以木为之。

《仪礼·聘礼篇》云：“宾入门三揖”。郑注：“入门将曲揖，既曲北面又揖，当碑揖”。

又“宾自碑内听命”。又“宾降自碑内”。《礼记·祭义篇》

云：“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注“丽，系也，谓牲入庙，系著中庭碑也”。《杂记》云：“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公食大夫礼，入陈鼎于碑南，此诸侯庙内之碑也。诸侯庙有碑，则天子庙亦有碑”。《仪礼·聘礼篇》又云：“陪鼎上当碑南”。

陈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行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宫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又醴

醢百甕夹碑”。《礼记·檀弓篇》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绋绕，天子六绋四碑，前后

4

各重鹿卢也。四植谓之桓，诸侯四绋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绋二碑，士二绋无碑。”《丧大记》又云：“凡封用绋，去碑负引”。郑注：“树于圻之前后，似绋绕碑间之鹿卢，輓棺而下之，此时棺下窆，使輓者皆击绋而绕，要负引舒纵之，被失脱也。用绋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以上录自《汉石例》之墓碑例。

刘熙《释名》云：“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輓轡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

《淮南子》云：“卢敖见若士遁逃乎碑。”高诱注：“匿于碑阴”。此见于西汉人书也，然则墓用石铭碑，与纪德铭碑，皆始于汉。

总之，先秦已有碑，但与后来墓碑不同，其用途有二：

一，用于宫庙内系牲畜，或用以识日影引阴阳。此类以石为之。

二，用于下棺，此类多以木为之，其上有穿。浙江禹陵之窆石，高约六尺许而上有穿。郑康成以为下棺丰碑之属。本无字，至汉始刻篆书。《金石录》与《图经》，都以为永康元年五月刻（公元167年）。此为石碑，非木碑。

《隶释》云：“碑之有穿，在庙则以系牲，在穴则以下柩”。“汉碑穿无不居中”。这符合实际情况。汉“杨统碑”有穿，但位置不居中。殆打碑者将碑文后之余石凿去，并非穿偏。

前述西汉《庶孝禹碑》有额，两旁各刻一鸟，有穿，穿下刻河平三年庶孝禹等字。东汉最早之碑是元初四年（公元117

年)《祀三公山碑》(见图版六),碑文长达二百余字,此一大发展。此时,碑多立于庙堂、神祠、神道之间或大道显见之处,用于颂扬功德,此制沿袭两千余年。

碑碣之分

《说文》:“碑,竖石也。”以文勒石,为纪前人功勋而用。在汉代一般是长方形,高六尺左右。也有碑首为圆形或较小者,或称方者为碑,圆者为碣;或称大者为碑,小者为碣。此为后人讲法,非汉代所称。

《隶续》曰:“《孔谦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晕一重,起于穿中,复有两晕在右,其一甚短,与他碑小异。”

《金石例》曰:“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按,此为隋制,非汉制也。

《孔谦碣》形体与其它汉碑无大差别,额无标题。又如《孔君墓碣》,也是圆首,额有篆书标题“孔君之墓”四字,并未写明是碑是碣。故碑碣之分,乃汉后之事。

《金石录》、《隶释》并载《故民吴公碑》、《童子逢感碑》。不论卑者或幼者均可刻碑。故称碑者,非以其官尊;称碣者,非以其官卑也。据《隶续》碑图,《堂邑令费君碑》有螭首,《太尉司空宗公碑》有圭首,可见螭首、圭首汉时也无定制。又《隶释》云:“《国三老袁良碑》铭曰:‘才本德曜其碣’。”此可证明碑、碣汉时通用。

唐《潘尊师碣》,制作非常宏伟,实是一通大碑,然首行书“唐默仙中岳岳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此又不符合小者为碣,大者为碑之说法。此是唐代称大碑为碣之例。

碑额与穿孔

古代之碑，多数有额有穿，也有少数无额无穿者。额有圆形与圭形，又有在额上雕刻螭、龙、虎、鸟等，为雕刻艺术品。

王愬甫《碑版广例》曰：“汉碑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绎之意。”

今据《圉令赵君碑》、《孔褒碑》、《赵荀碑》等汉碑来看，其晕皆从外起，无一自穿中出。如此古制，在汉末已消失。

《郎中郑固碑》、《司隶校尉鲁峻碑》、《白石神君碑》、《鲜于璜碑》（图三）、《张迁碑》等是圭首。《白石神君



图三 《鲜于璜碑》之圭首

碑》圭首两旁各透雕一兽，兽下又各雕一人。《鲜于璜碑》碑首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篆书旁刻青龙白虎，碑阴额仅刻朱雀。《荡阴令张迁碑》，圭首四面蟠螭，其锐处两鹄相对，造型生动，刻技甚精。

圆首上刻绳纹者有《卫尉卿衡方碑》、《三老掾赵宽碑》等。圆首透雕龙者，有《巴郡太守樊敏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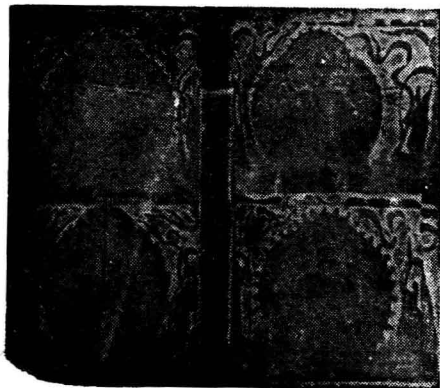
汉以后碑首多为蟠龙，如《宁州刺史爨龙颜碑》，仍循古制有穿，穿上为蟠龙，穿旁一日一月，日中伏鸟，月中蟾蜍。至唐代碑较特殊，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图四），首刻七佛（图四为其中四佛）。《道因法师碑》，首刻释迦牟尼、大势菩萨、观世音菩萨三佛，并刻佛名，此乃碑额中仅见者。

汉碑有穿，有两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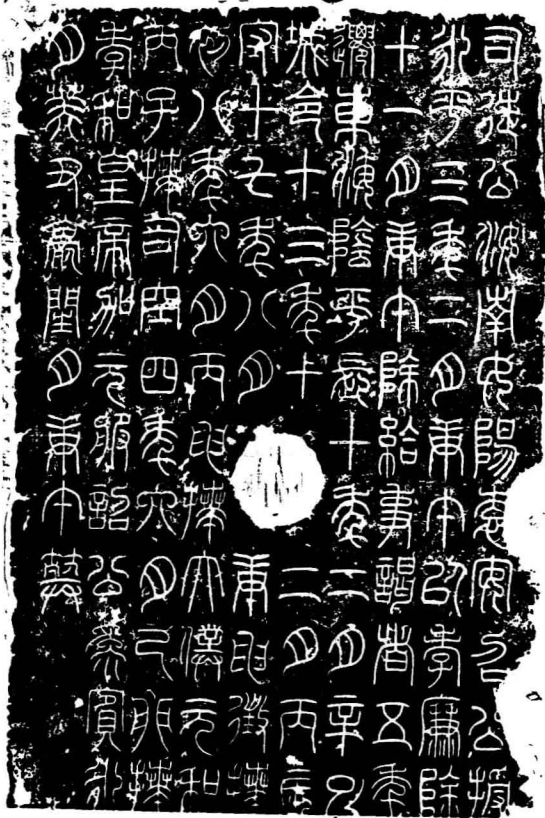
一种是利用以前下棺、系牲旧碑，加刻碑文，穿孔仍存。

另一种为新造碑，沿袭古制，仍凿穿孔，但此时穿孔已无实际用处。

碑之穿孔，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偏左或偏右，并不划一。一般在碑额标题之下、碑文之上，于书写碑文无碍。可是《赵钊碑》之穿，在碑文中间九行至十行处，每行占三字。《袁安碑》无额，穿在碑文之中，占两行，每行二字（图五）。《袁敞碑》穿亦在碑文中，占二行，行二



图四 四佛像



图五 《袁安碑》

字。“应迁”等字碑穿亦居中，且较大，占三行三字。穿之最下者，莫过于《景君碑》，在碑文之第八行至十三行处，每行占二字。此种穿孔于碑文之中者，可能是因利用旧碑石书刻碑文而造成。

汉碑也有无穿者，如《祀三公山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赵宽碑》、《曹全碑》等。取消穿孔，为一大进步。汉后之碑皆无穿孔。

碑 与 碑 趺

汉代碑一般六尺左右高，二尺左右宽。至南北朝略有增加，高也不过七、八尺。唐代官职大者其碑有高一丈、宽三尺者，官职小者高六七尺。宋代《韩蘄王碑》，高近三丈，是碑中之最大者，可能因王爵之故。

吴《禅国山碑》，形微椭圆，上尖而微凹，石色绀碧，俗呼“圜碑”。

汉《竹叶碑》，碑阳有字似七行，仅首行“之”字，二行“祖”字，三行“造”字等三字可辨。惟碑阴存二列，上列十二行，下列十行，字较清晰，而且书法秀丽。石面有天然之竹叶纹，故俗称之为“竹叶碑”。

隋《栖严道场舍利塔碑》，石质斑驳，岩粒突起，如颗颗丹砂，虽精拓也不能灭其迹，故称其为“鱼子碑”。

唐《石台孝经碑》，高一丈五尺余，四面均宽五尺，是由四石合成，故中空，上覆以石盖，下碑趺方形，浮雕图案画为碑中仅有者。

泰山南麓，有唐《岱岳观碑》，碑高八尺许，以二石合而束之。每面碑文作四、五层，每层诗文一首或二首，是自唐显庆六年至大历七年百余年中陆续刻上者。《建醮造象记》，两侧亦刻三十余段，当地人称为“鸳鸯碑”。

唐李训等造《大道天尊像记碑》，后人又称《碧落碑》，篆书，字难尽识（见图版四十七）。幸赖唐咸通十一年郑承规之释文，方知碑文意义。碑无书具体年月，然首行有“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哀子李训谨撰，谌衔恤在疚，真怀靡所言报

德思树良因敬立”。第二行有“大道天尊逮侍真像……”等字。碑文后只有“伏愿栖真碧落，飞步黄庭”之语。称“碧落碑”，似不适宜。宜称《李训等为妣妃造大道天尊石像记碑》。

“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碑在绛州龙兴宫。董道《广川书跋》云：“段成式谓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谓碑在碧落观，故名”。今以碑文验之，仅有“棲真碧落”一语，既非全文结束，亦非文中要语。古人诗文，多以行首数字标目；以末字定名，实属偶然。《集古录》谓“龙兴宫有碧落尊象，篆文刻其背。”龙兴宫，旧名碧落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李训等造大道天尊象记，世所称碧落也”。以上诸家所云，惟董、钱所云正确，“碧落碑”之称是后起名，今特记之，以正数百年之误。

《唐故叶有道先生神道碑》，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立于松阳永宁观。《金石萃编》著录其事并载全文。《屠隆考槃余事》云：“有道先生叶公碑，李邕行书，石在山东金乡县”。《集古求真》云：相传为追魂碑，盖小说所载，齐东野人之语不足取信。又云原石久佚，今日所有者，明嘉靖时复刻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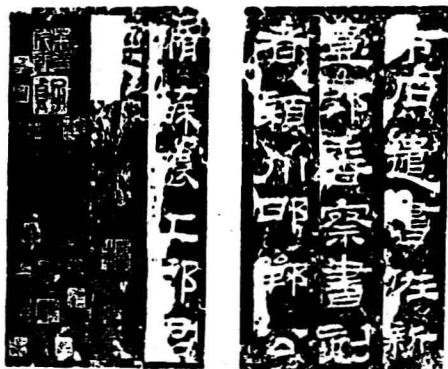
《处州府志》云：“开元间，松阳叶法善以道术遭遇玄宗时，李邕为处州刺史，邕以词翰名世。法善求邕与其祖有道先生国重作碑，邕从之。文成请并书，弗许。一夕，梦法善请曰：‘向辱雄文，光贲泉壤，敢再求书？’邕善而为书未竟，钟鸣梦觉，至丁字下数点而止。法善刻毕持墨本往谢，邕惊曰：‘始以为梦，乃真邪？’世传此碑为‘追魂碑’。”碑文一千一百余字，未见丁字下数点者，可见《处州府志》所云乃旧时迷信传说故事。

《中州金石记》记载，《重修古定晋禅院千佛邑碑》，为天成四年九月释道撰，因其石质坚而细，又经许多人常常摩挲而光亮，人到碑前，反射人影，故俗名“透影碑”。

唐高宗李治之陵，名曰乾陵，在陕西乾县，陵前有二碑，一为《述圣记碑》，述高宗李治之圣德；一为《无字碑》。据《来斋金石刻考略》云：“碑石来自于阙”。二碑至今尚存，十分雄伟，高二丈，无字碑后来刻字，有女真文，文为“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事在天会十二年十一月。

《泰阴碑》，为宋登泰山谢天书述圣功德铭碑。碑为五石合成，高约九尺。一石三尺，二石二尺五，三石五尺三，四石四尺五，五石三尺。宋大中祥符元年立石，在山东泰安城，南门外北向。明巡按吴从宪篆刻其阴曰《泰阴碑》。王兰泉曰：北向，属泰山之阴，故题“泰阴碑”三字。以讹传讹，谓之“阴字碑”。

《三绝碑》，《汉隶字源》云：“受禅表，魏黄初元年立，在颍昌府临颖县，唐刘禹锡谓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见图版十九）。此碑现时尚存，也有清代拓本，然碑上并无三人之名，不知刘禹锡何以知之？如《西岳华山庙碑》，为书佐郭香察书（见图六），刻者为邯郸公恪。《西狭颂》与《郾阁颂摩



图六 《西岳华山庙碑》

之三绝”（见图版十九）。此碑现时尚存，也有清代拓本，然碑上并无三人之名，不知刘禹锡何以知之？如《西岳华山庙碑》，为书佐郭香察书（见图六），刻者为邯郸公恪。《西狭颂》与《郾阁颂摩